

紧抓向新提质的人才关键

□ 黄璐 刘明焘

■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是培养壮大能够持续创造和熟练操作新型劳动工具、拓展和创造新型劳动对象、使用和维护新型基础设施的高素质新型劳动者队伍

■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能否以“链式思维”看人才,是发挥人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撑作用的关键和前提

代工作环境,具备跨界融合的综合能力,是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最活跃、最能动的主体。因此,能否紧抓人才这个“关键变量”,找到人才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对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内在机理

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因此,能否以“链式思维”看人才,是发挥人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撑作用的关键和前提。

人才链包含“横”“纵”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是人才的类型,从人才在科技和产业领域所发挥作用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可以认为人才链是包括基础研究人才、应用研究人才、技术应用人才、成果转化人才、产业人才等一系列不同类型人才的链条,不同类型的人才将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以及创新链产业链融合过程中发挥各自的差异化作用。纵向维度是人才的成长过程,对于每一类特定的人才,人才链要囊括三条链式结构,第一条是针对社会工作阶段,包含从人才的识别、培养、引进、使用、保障、激励、评价到流动等人才成长全生命周期的链式结构,主要描述用人主体从选人、育人、用人到留人的整个过程,反映了人才作为一种资源要素在社会上的流动过程;第二条是针对教育阶段,包括从学前、小学、中学等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到大学本科(或专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链式结构,反映了人才作为创新要素在学校的培育和成长过程;第三条是针对人才的职业发展阶段,

从功能性角度出发,包括从基础科学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等基础技能型人才,成长为管理型人才、创业型人才、复合型人才等进阶专业型人才,最后发展成为引领型顶尖人才的链式结构,反映了人才作为智力资源在职业层级上的认知进阶过程。

在实践中,应综合人才链的横纵两个维度一起来考察各类人才所处的发展阶段,并强调人才链要围绕创新链、产业链及双链深度融合各个阶段和环节的需求进行动态适应,从系统观、动态发展观的角度明确人才链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定位。

关键作用

近年来,在发挥人才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方面,政府部门、高校院所、产业园区等都做了一些有益探索,涌现出一批值得推广借鉴的实践案例。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现有人才资助体系基础上,设立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将资助端口前移,旨在及早选拔人才,培育科学素养,激励创新研究,为构建高质量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供“源头活水”。又如,深圳零一学院、深圳科创学院、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浙江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等机构建立了“科研-转化-产业”的全链条企业培育模式、构建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的全链条孵化载体,并运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产业人才的供需匹配。苏州工业园区推进“产业地图”和“人才图谱”相融共进,营造“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实现领军人才、新兴产业和创新集群的“链式效应”。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发挥人才在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更好服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山东这种偏重产业结构的技术进步所需的是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等领域的突破,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一般性创新成果难有用武之地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山东应以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为契机,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展生态。2023年山东“雁阵形”集群规模超过9.2万亿元,“雁阵形”集群达到18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7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15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聚焦、特色突出、要素汇聚、网络高效的优势开始显现。

把握山东工业技术进步特点

山东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是原始创新。山东偏重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中上游企业相对居多的特征,隐含着更多科学原理和隐性知识,对技术进步要求更高,需要更为长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这种偏重产业结构的技术进步所需的是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等领域的突破,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一般性创新成果难有用武之地。更有难度、更复杂的创新,必须整合优势科技资源,持续下更大的功夫,才能实现关键技术进展,这对于某一个省份、某一个区域来说是巨大挑战。

科技革命能为山东工业催生更多衍生产业。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山东工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既要看到颠覆性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数字化、人工智能带来的更多发展机遇。这些进步和变革将为山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提供更多可能。山东偏重的工业结构具有更多的母性特点,在新的技术作用下,更容易催生出生具有关联性强和发展前景广阔特征的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制造等衍生产业。同时,约束传统产业发展的各种绿色技术瓶颈获得突破,可以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发展能级和发展空间。除此以外,新一轮科技革命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而且去中心化特征更加明显,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极大增强,这对于更需要原始科技创新,且对外依赖性较高的山东

□ 范玉波

推进新型工业化

阶式成长“快车道”。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密不可分,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可以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山东应以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为契机,培育更多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数字技术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传统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主要来源于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山东是工业大省,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能够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基础支撑。山东应通过场景化方式推动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探索智能设计、生产、管理、服务模式,树立一批数字化转型的典型标杆。要以国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山东工业云”为数字底座,面向省内优势产业集群培育一批行业“产业大脑”,加速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推动工业互联网与重点产业链“链网协同”发展,支持构建数据驱动、精准匹配、可信交互的产业链协作模式,建设智慧产业链供应链。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催生经济发展新动能。立足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取得的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山东应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海洋、医养健康等“五强”新兴产业的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和实力。推动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新模式、新业态,使产业加速崛起、扩容倍增,努力构建形成“5+N”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新格局。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山东要以大力推动15个省级未来产业集群建设为契机,聚焦元宇宙、核能、氢能、基因和细胞诊疗、空天信息、深海极地开发、脑机结合、量子信息等领域,着力打造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加快推动创新突破和融合应用。同时,进一步支持省内国家级高新区深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在基础前沿领域的研发合作,强化未来产业技术源头供给,面向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前瞻部署一批未来产业。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明确了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与可及性将成为新时代我国公共服务的发展方向,并指导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改革任务。

从功能定位来看,均衡性与可及性体现出公共服务的不同侧面:均衡性意味着要在宏观层次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供给的过程均衡和结果均衡,以避免生产端与供给端之间差距过大;可及性重在公共服务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微观适配,尤其要实现具体服务内容与群众实际需求的有效衔接。2023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这是继2021年国家发布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以来的首次调整,标志着我国在公共服务均衡性方面取得重要制度进展。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增强可及性成为持续深化公共服务改革的又一关键抓手。实现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群众在统一制度框架下切实享有各项服务内容,更是确保各类公共服务资源精准落地的重要前提。

更可及的公共服务,重在实现“滴灌式”变革。这与当前社会治理的精细化转型高度契合。社会治理是针对具体事务、直面治理效能的治理场域,需要具体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等治理功能。新时代十年,我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发展态势和治理情景的显著变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逐渐由“有没有”向“好不好”深刻转型,社会治理工作愈发展现出多层次、多样态等阶段特征,并对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会治理领域是具体治理事务及其效果的集合体,更可及的公共服务不仅能具体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共富共荣的发展成果,更将直接影响群众在获得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追求更可及的公共服务,重在通过公共服务流程的优化,尽可能避免政策设计与执行过程中的“悬置”现象,以更具体的解决方案,切实增强公共服务获得感。因此,在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方面持续发力,既肩负着反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期许,同时,对于赋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直接意义。

高质量的基本服务,应涉及服务规划、服务供给和服务应用等全流程。聚焦空间配置、治理资源与供需衔接等社会治理关键场域,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亟须化解如下关键梗阻——

关键梗阻之一:聚焦公共服务规划过程,需要妥善解决空间配置失衡难题。更可及的公共服务,必须实现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覆盖范围之间的相对均衡。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国情。任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抉择,都是充分考虑其治理规模的结果。就大国而言,其区域层次的差异性以及群体需求的异质性,会直接诱发公共服务空间配置不均、主体互动阻隔等问题。传统公共服务模式重在对应区域边界的硬性划分和群体需求简单分类,极大制约了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面对更纷繁复杂的社会治理诉求,必须从空间规划环节开展前置性的制度设定。

关键梗阻之二:立足公共服务供给过程,需要有效回答治理资源低效难题。更可及的公共服务,必须补齐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与资源保障之间的现实短板。从我国社会治理前沿实践来看,已经涌现出以政府购买服务助力社会组织成长等有益探索,较好达成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层目标。既有经验表明,实现公共服务的“人人可及”,离不开专业人士、资金等各类治理资源的系统保障。但碍于显性边界壁垒与多主体协作梗阻的现状,公共服务依旧受制于资金来源单一、资源汲取能力较弱等制度约束难题。因而,在资源获取与调动等方面持续挖掘现有制度潜力,不仅是政府职能优化走深走实的具体表现,更是夯实社会治理效能的必要前提。

关键梗阻之三:面向公共服务应用环节,需切实回应供需衔接错位难题。更可及的公共服务,必须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与实际需求之间的高效匹配。进入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利用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与高效对接,是新发展条件下必须回答好的问题。但更应认识到,数字时代的多样态技术手段、复杂化治理场景同样对公共服务的供需衔接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可能造成数字与民生治理需求等潜在问题。从公共服务应用场景来看,技术条件进步既为创新供需衔接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机会可能,但同样放大了不同群体之间实现供需匹配的操作难度。因此,更需要以群众的工具体体验和获得感为标尺,着力提升覆盖人群的全面性,供需对接的精准性和应用手段的便捷性。

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始终是党和国家深化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更是系统解决社会治理普遍难题的重要契机。近年来,山东省在党建引领汇聚资源、推动治理重心下移、以“智”促“治”等方面,不断探索出更具地域特色和显著效能优势的有益经验。山东实践表明,系统推进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深入贯彻“空间适配—制度保障—整体智治”的中国式公共服务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必然选择,更将持续赋能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首先,优化公共服务的“空间方案”,完善社会治理的宏观安排。空间是居民与政府、社会、市场的互动场域。为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需明确回应服务内容、空间边界、服务结构的空间尺度、服务半径的空间可及性等关键议题。应进一步探索突破行政边界的空间适配路径,科学统筹公共服务事业的布局安排,更好奠定创新社会治理的宏观基础。同时结合社会治理领域事务具体、任务繁多等实际特点,重点聚焦邻里社区等低尺度单元,坚持以“像绣花一样精细”的空间治理态度,不断推进多层次公共服务体系与大量微观社会治理单元的对接匹配。

其次,做好公共服务的“制度功课”,夯实社会治理的保障体系。可及性不仅需要空间位置上实现触手可及,更要确保服务内容、受众需要与资源支撑之间的高效匹配。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并非意味财政支出规模的线性增长,而是需要立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重新审视财政资源使用途径、社会资源挖掘、跨主体协作等既有制度内容。尤其要着力优化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的资源汲取方式与灵活运用手段,以实现公共服务治理资源的精密保障、精准投放和精细管理,为优化治理资源配置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深描公共服务的“数字画卷”,实现社会治理的整体智治。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有效衔接,是实现公共服务全流程治理的关键一环。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手段,已然为实现更可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了科学化治理手段与强有力的治理工具。尤其是平台驱动的数字化优势,能够精准实现供需识别与系统汇集,并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场景的灵活设定,提高面向社会治理领域的差异化服务能力。因此,应持续推动多样态便民服务与多场景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更好契合当前社会治理领域所面临的供需张力,从而真正提升公共服务的系统效能。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增强公共服务可及性

□ 于棋